

郑诗琳, 黄焕, 张晓梦, 等.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J]. 地理科学, 2022, 42(8): 1474-1482. [Zheng Shilin, Huang Huan, Zhang Xiaomeng et 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mode and development elements interaction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calization: A case of bamboo craft village in Chongzhou County, Chengdu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8): 1474-1482.]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8.015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 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 ——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郑诗琳^{1,2}, 黄焕², 张晓梦², 史甜甜²

(1. 广东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地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2.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治理发挥要素优势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四川省竹艺村为例, 从发展要素视角探析从 LOT(Lease-Operation Tourism)模式到 LOT-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融合模式转变中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 旅游治理模式决定了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 要素的互动关系亦推进了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 两者之间呈现循环往复的作用路径; ② 不同主体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从旅游业中获益程度不同; ③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竹艺村形成了竹艺村-乡村企业-农户家庭层层嵌套的 3 层旅游发展层级; ④ 社工的进驻推进了模式融合和发展要素的层级间流动, 实现了 2 种模式优势叠加。

关键词: 全球地方化; 旅游治理; 发展要素; 治理模式; 乡村旅游

中图分类号: F591.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2)08-1474-09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随着旅游地文化特色、风俗习惯等地方要素受到重视, 旅游业被视为展现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主要载体^[1]和链接全球要素和地方主体的全球化过程^[2]。在旅游情境下, 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全球化发展要素进入地方, 并与土地、文化等地方化发展要素形成了深刻的交互^[3]。其中, 具有丰富旅游资源传统乡村作为旅游开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地区^[4], 成为全球化与地方化发展要素整合与互动的重要交汇地^[3]。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 企业、社工等外部主体向乡村流动, 给原有乡村治理模式带来挑战, 形成新的旅游治理体系^[5]。旅游治理模式在全球化发展下趋向多元, 又在地方化要素参与下显现创新, 成为彰显全球地方化进程的重要表征^[6]。而旅游地构建科学有效的旅游治理体系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实

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7]。不同的旅游治理模式各有优劣, 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相异的影响^[4]。当下研究大多认为由外部企业主导的租赁经营旅游治理模式(Lease-Operation Tourism, LOT)能够为旅游地带来大量的全球化发展要素以促进目的地的快速发展^[8], 但因其更注重投资收益, 会导致居民权益受到忽视等问题^[9]。而由社区主导的旅游治理模式(Community-Based Tourism, CBT)因其对乡村的嵌入性较强^[4], 能改善居民生计, 是更为有效的旅游治理模式^[9]。已有研究认为在基础设施缺乏的偏远地区, LOT 模式更适合其初始发展, 从综合效益考虑, CBT 模式更具优势^[8]。

在不同的旅游治理模式中, 由于治理主体的管理体制、价值取向等存在不同^[4], 全球化发展要素与地方化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也存在差异^[6]。当旅游

收稿日期: 2021-09-24; **修订日期:** 2022-02-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28, 41501158, 418011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9M652934)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801128, 41501158, 41801127),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9M652934).]

作者简介: 郑诗琳(1988-), 女, 广东汕头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文化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504497688@qq.com

通讯作者: 史甜甜。E-mail: tiana_shi@163.com

治理模式发生转变时, 权力、资本等发展要素的交互作用推动了地方的尺度重组, 深刻影响旅游地的发展^[3]。

在中国乡村发展情境下, 村落的发展并不一定只采用单一的旅游治理模式, 亦会出现多种旅游治理模式共存融合的情况。随着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和融合, 发展要素的整合主体和投入导向亦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并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而剖析旅游地演变下全球地方化力量的作用路径, 探索能促进不同发展要素有效参与的治理模式, 成为了需要解决的研究议题^[6]。

基于此, 本研究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为案例地, 基于全球地方化背景剖析不同旅游治理模式下发展要素的互动过程, 以期丰富旅游治理模式研究, 并为同类型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全球地方化、发展要素与旅游治理模式

随着全球化发展, 地方逐渐被卷入全球化进程^[2]。Robertson 认为表征为“世界压缩”的全球化进程中愈发涉及地方性的创造与整合, 反对全球化与地方化对立观点, 强调应从全球地方化视角, 从全球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来重新审视全球化概念^[10]。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和链接是推动旅游地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6]。地方的构成需要跨地方的要素, 全球商品和服务的推行需要在地化的量身定制, 全球与地方之间各种要素的关系问题在各种知识和实践背景下变得越来越突出^[10]。随着旅游开发主体进入地方, 全球化空间尺度下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也随之进入, 国际资金、治理经验等全球要素聚集于旅游目的地空间^[6,11]。旅游地自身所具有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民俗节庆等地方化发展要素得到利用, 并通过全球要素和地方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被不停地重塑和创造^[12]。这种全球化发展要素对地方化发展要素的整合与利用形成了涵盖地方与非地方混杂的消费景观^[13]。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 发展要素与多等级的空间尺度相联系^[3]。依据发展要素的流动性, 将从旅游地外部流入的资本、技术、设计、人才和管理等全球流动要素划分为全球化发展要素, 将地方资源禀赋、文化景观等附着于旅游地的内部因素划分为地方化

发展要素^[6,11]。从地方上推尺度剖析发展要素的流动时, 旅游地作为最低尺度^[6], 以地方化概括其发展要素是合理的。但如果将尺度下推到旅游地系统内部, 地方化发展要素则显得笼统与模糊。全球地方化的发展离不开个体的实践^[13]。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亦与资金、人力、住房、耕地等农户生计资本要素紧密相关^[14]。因此有必要将旅游地内部发展要素划分为文化景观、自然资源等目的地具有的地方化发展要素以及来源于农户家庭自身的资金、劳动力、房屋、农地等个体化发展要素。

旅游业作为一种由消费和生产共在的现象, 本质上是涉及地方再造的全球性过程^[12]。资金、人才等全球化发展要素流入旅游地, 不仅重塑地方, 亦给旅游地原有的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5]。当下如何结合旅游地发展的差异化情境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并应用于中国体制下的旅游开发已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15]。旅游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不同类型旅游治理模式的讨论, 围绕分类方式^[16,17]和不同类型模式的特点与对比^[4,8,9,15,18]展开。不同学者针对旅游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分类方式, 如 Hall 等从治理路径视角出发, 将旅游治理模式分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以及互动网络型^[16]。Angella 则基于治理功能的集中程度和协调机制的强弱将旅游治理模式划分为监管型、创业型、企业领导型及离散型 4 种类型^[17]。常见的旅游治理模式主要从治理主体角度分类^[19]。依据治理主体的不同, 主要分为 3 类旅游治理模式: 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 (Government-oriented Promotion Pattern)^[20]、租赁经营旅游治理模式 (Lease-Operation Tourism, LOT) 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Community-Based Tourism, CBT)^[8]。不同的旅游治理模式中因权力架构、治理主体、分配方式等存在差异^[21], 发展要素的使用与流动路径亦有不同^[4,18,22]。

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是政府作为主导角色采用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措施来引导地方发展的模式^[20]。该模式主要使用政策、管理、资本等发展要素对旅游地进行开发, 有高效的优势, 被多个旅游地采用, 但亦导致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18]。LOT 模式是商业公司有权在政府当局授权的社区中进行旅游开发、管理和经营的治理模式^[8]。在该模式下, 外部开发主体带着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全球化要素进入地方, 有效促进了地方旅游经济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多元文化的发展^[22]。然而, LOT 模式因注重

效益第一,被质疑容易忽视当地社区居民的权益^[9]。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是指基于社区的旅游业治理模式,强调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旅游发展和管理中^[8]。这一旅游治理模式的核心是村民参与,村民的个体化要素如房屋、劳动力等得到利用^[4,18],有助于提升地方经济的稳定性^[23]。

Qian 等通过 LOT 和 CBT 模式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偏远地区,LOT 模式能够在旅游开发的早期阶段为目的地带来基础设施,助力旅游发展^[8];但从长远来看,CBT 比 LOT 在效益和公平上更具备优势,更适合中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9]。而政府主导以及公司主导虽然发展态势较强,但难以充分兼顾居民利益,社区主导虽然发展态势相对较弱,但居民参与积极性更高,整体可持续性更强^[18]。杨昀等则提出社区主导模式的商业效益优于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则更有优势,而村企共治模式的综合效益最佳^[15]。

当前旅游治理模式研究聚焦于某一治理模式对地方影响的探讨或是不同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对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转变下各类发展要素的互动过程关注仍尚显较少,而如何在全球地方化背景下理解全球化与地方化要素的作用路径并通过发展要素的有效利用来实现旅游治理模式创新已成为重要问题^[6]。因此,本研究以经历了不同旅游治理模式的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案例地,探讨全球地方化背景下竹艺村从 LOT 模式再到当前 LOT 模式与 CBT 模式相融阶段的发展要素整合机制,以期为分析旅游治理模式演变的作用路径提供参考。

2 研究案例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地为四川省成都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竹艺村位于道明镇龙黄村村域,由龙黄村下辖的 3 个村民小组组成,占地 8.2 hm²,现居住人口为 86 户、295 人(四川县域经济网, http://www.ddxyjj.com/zhuanti_xiangxi.asp?i=12297)。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2016 年竹艺村开始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工艺发展旅游产业,和崇州文旅集团合作,对龙黄村进行总体规划,2017 年 3 月特色地标建筑竹里项目建造完成,2017 年 10 月竹艺村项目提上日程,2018 年 2 月竹艺村正式开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https://www.scdaily.com.cn/cmsid/20201202A0HUL700?AD%20TAG=baidutw>)。崇州市朝晖社工等非政府工作组织亦进

驻竹艺村,旨在提升乡村居民生活文化素养和社区旅游参与度。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竹艺村经历了不同的旅游治理模式,从早期的由崇州文旅集团进驻形成的 LOT 模式转向社工进驻后逐步形成的 CBT 模式,从而逐步从 LOT 模式过渡到 LOT 与 CBT 融合的模式。在旅游业发展后,LOT 模式下资本、人才等全球化发展要素的流入有效推动了竹艺村的旅游发展,但与此同时,新的发展问题亦逐渐暴露。在此基础上,竹艺村进一步融入 CBT 治理模式来缓解已有的社区参与度低问题。当下,竹艺村作为通过治理转型实现旅游发展的成功典范,是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以实现优势叠加的典型案例。

研究团队于 2020 年 8 月 6~31 日在竹艺村进行调研,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政府、社工、农户和旅游企业员工等群体展开了调查。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访谈对象共 26 人次(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对部分访谈对象进行了电话或者微信回访),其中农户 15 人次、政府及管委会工作人员 3 人次、新村民 4 人次、旅游企业员工 2 人次、非政府组织人员 2 人次。文章涉及访谈引用的群体分别编码为:农户(CM)、旅游企业员工(QY)、新村民(XM)、政府及管委会工作人员(ZF)以及非政府组织人员(SG)。

3 自上而下:LOT 模式下全球化发展要素的整合与地方博弈

3.1 全球化发展要素整合下模式优势凸显

外部企业主导的 LOT 模式因能为旅游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区快速引入资金、技术等发展要素,是处于发展初期的旅游地适合采用的治理模式^[8]。在旅游开发前,竹艺村作为一个传统的乡土村落,是以村委会-村民小组二级治理体系为主。2016 年竹艺村引入崇州文旅集团等外部企业,以此谋求地方资源的整合,推进乡村建设。外部企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外部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信息等全球化要素,亦使得竹艺村的治理模式发生转变。崇州文旅集团开始成为竹艺村旅游开发的治理主体,竹艺村治理形成了 LOT 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企业通过利用资本、规划设计理念、人才、营销管理经验等全球化发展要素对竹编文化、自然景观、公共用地等地方化要素和当地农户的房屋及农地等个体化要

素进行整合,以此推进竹艺村的旅游开发。

1) 在发展要素整合过程中,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崇州文旅集团一是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资本及设计资源,邀请了国内外设计师依据当地竹编文化特色来进行景观设计与规划,打造既具有全球设计风格又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消费景观;二是通过资本流转农地与农户房屋修建基础设施,如对道路和建筑进行翻新改造、租赁农户房屋开办接待业务,将农地改造为景观田等,以此提升竹艺村的旅游吸引力。全球化背景下,创造意义和体验是资本积累的关键途径,旅游资本的运作更是紧密地反映这一逻辑^[12]。文旅集团和外来商家带来的资本要素,亦是遵循旅游资本运行的逻辑。这些资本要素通过对竹艺村的自然景观、竹编文化和土地功能的改造,塑造了竹艺村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相融合的地方形象,以此契合游客乡土休闲的消费需求从而获取资本积累,由此彰显了资本运作的全球特性。

2) 依据旅游地风貌协调的规划理念,外部企业对村民房屋风格进行限制,力求打造具有川西林盘特色的乡村景观:“(竹艺村治理改造)主要是拆(雨棚、水塔、违建)、保(老茶坊、青砖围墙、原有风貌)、改(屋面瓦、围墙)、建(第五空间、染坊)(QY1)”。

3) 企业运用成熟的营销管理经验,与阿斯顿马丁等国际品牌合作举办相关营销活动,还邀请了环球电视台制片人、文化旅游博主等国际媒体人到访体验和宣传竹艺村文化,并在微信公众号、新闻网站上进行竹艺村的旅游形象打造与营销推广。

4) 竹艺村借鉴了日本濑户内海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经典案例(封面新闻, <https://www.thecover.cn/news/1386367>),引入旅法艺术家等有国际化背景的新村民在村内开办美术馆。新村民的到来,进一步打造和强化了竹艺村竹编文化特色。不管是建筑还是陈列作品,新村民的创作设计均体现国际美学理念与川西建筑、竹编文化等地方化发展要素的在地结合。

将 LOT 模式引入旅游发展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可带来充分的全球化发展要素与地方化、个体化发展要素整合,从而促进地方经济演变与发展^[4]。竹艺村外来企业通过资本、规划设计理念、营销管理经验、人才等全球化发展要素对竹艺村的土地和竹编文化等地方化发展要素以及农户的房屋、农地等

个体化发展要素进行整合。在企业主导、社区响应的 LOT 模式下竹艺村短时间内便从一个传统村落转型为具有全球地方化特色的知名乡村旅游地。竹艺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 2016 年的 1.59 万元增长到 2019 年 3.21 万元^①, LOT 模式的优势就此显现。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旅游地被来自全球和地方尺度的力量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路径进行改造^[24]。LOT 模式中,外部企业作为治理主体,以从更高尺度空间流动来的全球化发展要素为主来整合地方化和个体化发展要素,竹艺村在全球与地方互动中更多地呈现为被自上而下的路径所塑造。

3.2 发展要素的利用差异与博弈下模式弊端显现

已有研究指出 LOT 模式这类外部企业主导的旅游治理模式因与当地社区的嵌入性较低而具有外部漏损高、社区参与低等弊端,但同时也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机会,从而实现地方的业态升级^[4]。

在 LOT 模式中,相较于农户个体化发展要素而言,外部企业带来的全球化发展要素具有更强的整合能力。此外,外部企业还得到相关政策支持,在村落旅游发展的权力架构上对发展要素亦有更高的支配权。因此,竹艺村的地方化发展要素和农户的个体化发展要素在 LOT 阶段更多表现为响应全球化要素的整合。但农户在此过程中亦会利用个体化发展要素整合地方化发展要素来争取参与旅游经营的机会,如利用家庭资金、房屋、劳动力等个体化要素整合地方竹编文化这一地方化要素来开办竹编纪念品店,或是将自家房屋改造成具有竹艺特色的民宿接待游客以获取收入。

在 LOT 模式下,企业与农户在利用与整合发展要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抵触与博弈。首先,在房屋、农地等个体化要素的整合上,农户不满文旅企业流转其房屋和农地的价格方案,因此对政府、企业流转房屋及土地的规划心存抵触。此外,在对公共道路这一地方化要素的利用上,农户和企业出现分歧。企业为保证道路整洁与通行,规定村民只能在划定区域内摆摊。然而,企业划定区域的空间并未能满足所有村民的经营需求,故部分村民会占用景区内公共道路来摆摊,但又因此遭受驱赶。尽管与企业相比,农户在地方化要素与个体化要素的整合与利用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农户基于自身利益需求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与全球化要素的整合进行博

① 该数据来源于竹艺村游客中心展厅图片。

弈,如趁管理人员不注意进行摆摊等。

LOT 模式中全球化发展要素对地方化和个体化发展要素的整合并非一帆风顺。村民一方面响应全球化要素的整合并尝试整合地方化要素来参与旅游经营获取收益,另一方面不断通过与全球化要素整合的博弈来争取更大收益。但在这种博弈抵抗中,村民仍处于弱势和相对被动的地位,其利益难以受到重视,进而影响其参与旅游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识。“那个(村子改建)是他们当官的事咯,不干老百姓的事了(CM2)”。

4 自下而上:CBT 模式下个体化发展要素的集合与向上整合

4.1 社工主体进驻与个体化发展要素的提升

在 LOT 模式中,全球化发展要素与地方化、个体化发展要素更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合关系,地方化、个体化发展要素被动地响应全球化发展要素的整合。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外部企业与地方居民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愈发凸显^[18],影响着旅游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有助于降低地方对旅游发展的不良反应,提升社区参与度的 CBT 模式开始被考虑施行^[23]。为提升社区居民的收益与参与度,地方政府引入新的治理主体——社工组织。社工的进驻带来了社区赋权和培力理念等管理要素、市政府支持经费等资金要素和高校专家等人才要素,并通过举办培训、讲座、村落互访等活动提升村民利用和整合发展要素的能力和意识,以此引导村民更好地参与到旅游发展中。

在社工利用全球发展要素提升农户的个体化发展要素过程中,社区赋权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工依托社区赋权这一国际社区发展理念,举办优秀社区交流互访活动和社区研讨会,并引导村民结合自身参访所得挖掘社区潜在的优势资源,探讨社区旅游发展问题和解决方法,以此提升村民参与社区事务和旅游发展以及整合地方化发展要素的意识。“(我们举办活动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先进的社区治理经验,对标学习人家好的东西,然后回来改造我们所居住的环境(SG1)”。此外,社工邀请了学界和业界专家到竹艺村为村民开办民宿经营指导、文创沙龙和营销培训等活动,利用人才要素去提升和培育村民整合和利用房屋、竹编文化等个体化和地方化发展要素的能力。再者,社工还提供资金与知识等发展要素支持,引导村民利用自身手工艺进

行自主小创业,如制作香囊售卖等,提升了村民经商能力这一劳动力要素。

相较于 LOT 模式下外部企业注重利用全球化发展要素对地方化和个体化发展要素进行整合,社工则注重借用全球化发展要素来提升个体化发展要素。社工通过利用管理、人才等全球化发展要素,提升农户经商能力与社区事务参与能力等劳动力要素。全球化发展要素与个体化发展要素的关系开始由整合转变为提升,村民对旅游发展和集体经济了解亦逐步加深,为 CBT 模式的形成提供支持。

4.2 乡村企业形成与个体化发展要素集聚

2020 年 1 月,36 位村民共同出资创立了成都竹谦居农业旅游观光有限公司这一乡村企业来整合竹艺村现有资源,谋求旅游收益。同年 4 月,为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道明镇与崇州文旅集团下属文旅公司联合成立道明竹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地方占股 90%,文旅公司占股 10%。自此,社区开始作为重要利益主体参与到地方旅游治理与发展中去,CBT 模式逐步形成。

CBT 模式下村民的个体化发展要素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合,整合地方化发展要素的能力亦得到增强。乡村企业通过农户资金、房屋、劳动力等个体化发展要素对人才、互联网技术、现代设计理念等全球化发展要素及竹编文化、自然景观等地方化发展要素进行整合,以此打造竹编工艺品生产、营销与销售产业链,塑造道明竹艺这一文化品牌。乡村企业的发展在借助 LOT 模式下竹艺村已有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客流量的基础上,打造多元化的旅游服务和产品,从而谋求提升社区旅游的自造血能力,帮助社区内部获取收益。自此,竹艺村旅游治理模式形成了 CBT 模式和 LOT 模式融合共存的局面。

在原有 LOT 模式中,村民在旅游收益分配中多处于边缘地位,社区内部大多借助于竹艺村的项目发展零散地参与到旅游生计当中。而通过 CBT 模式的融入后,处于村企业中的村民无论是在治理架构中的话语权亦或是自身发展要素的整合能力均得到了提升,在竹艺村旅游治理和旅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亦逐步凸显。在 LOT 模式与 CBT 模式融合的阶段,全球化发展要素对地方化与个体化发展要素的整合依然存在,但 CBT 中不同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路径与 LOT 模式存在差异。在互动关系上,CBT 模式中全球化发展要素

对个体化发展要素由整合变为提升。在互动路径上, CBT 模式个体化发展要素自下而上整合全球化和地方化发展要素的能力大大增强。LOT 和 CBT 模式的共存, 呈现出全球地方化下旅游地塑造力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结合的特点^[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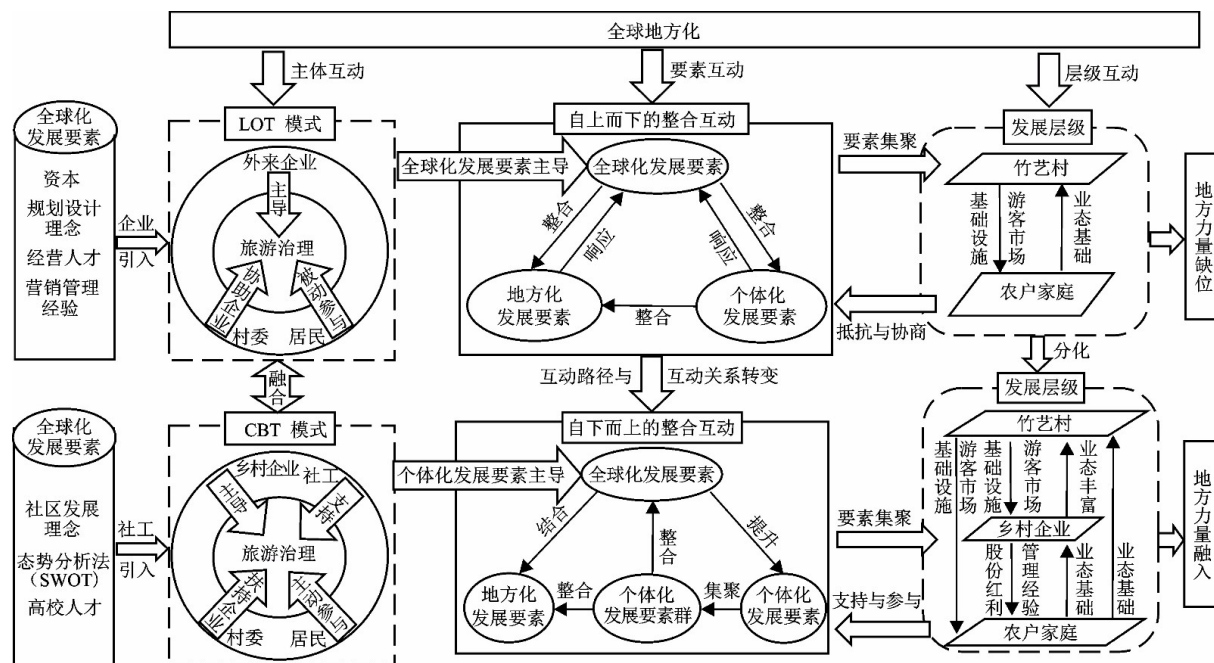
5 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发展要素的多层集聚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 资本、文化、资源等发展要素在不同尺度空间上被整合^[3]。随着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 全球化、地方化和个体化发展要素亦在旅游地内部的不同发展层级中集聚。在 LOT 模式中, 旅游地具有两层发展层级: 第一层是竹艺村本身作为一个地方文旅项目的发展, 大部分发展要素均被外部企业整合并投入该发展层级当中, 企业通过要素整合开拓了游客市场, 打造了地方品牌; 第二层级则是农户家庭的发展层级, 该层级被嵌套在上一层发展层级下: 一方面农户的个体化发展要素不断被整合流入第一层发展层级, 另一方面第一层发展层级亦为农户的生计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条件(图 1)。

之后, 村民自发入股成立了乡村企业参与发展要素整合, 竹艺村 LOT 模式的框架内形成了新的

CBT 治理模式, 并且实现了二者融合。在 CBT 模式中, 村民个体化发展要素将地方化发展要素进行整合, 投入到乡村企业的发展当中。在这个背景下, 逐步形成了乡村企业这一新的发展层级。乡村企业发展层级位于竹艺村和农户家庭发展层级之间, 三者是层层嵌套的关系。在 3 层层级的嵌套模型中, 竹艺村作为 LOT 模式下的主要发展层级, 为其下两层发展层级提供着市场、品牌和基础设施等诸多的发展条件。乡村企业这一发展层级也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旅游营收等发展资本, 促进下一层村民个体的生计发展。与此同时, 乡村企业所打造的文化品牌和旅游体验活动也反哺了竹艺村整体的发展。第三层农户家庭发展层级不断为其余两层提供业态支持, 同时也享受着其余两层发展层级带来的发展红利, 以此不断提升自身的可持续生计。

LOT 这类外部企业主导的旅游治理模式并不一定能有效改善居民生存状况^[8,9]。在该类模式下, 发展要素主要集聚于企业打造的发展项目之中, 农户发展层级只能依赖于上层发展层级形成的游客市场和基础设施等发展红利发展旅游生计, 获取微薄的收益。而 CBT 这类社区主导的旅游治理模式虽形成了乡村企业-农户家庭二层发展层级, 却又因



LOT 为由外部企业主导的租赁经营旅游治理模式; CBT 为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图 1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下发展要素互动机制

Fig.1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elements under different tourism governance modes

在旅游开发初期缺乏资本、技术等发展要素来建设基础设施^[8],加之因学习机会不足而导致地区发展缓慢^[4]。因此,在不同旅游治理模式下,发展层级的构成与发展要素的流动关系存在差异,由此对农户个体的生计产生了相异的影响。但两种旅游治理模式的融合在竹艺村中呈现出了优势叠加,LOT模式形成的竹艺村发展层级为农户和乡村企业提供了游客市场与基础设施,而乡村企业这一发展层级在丰富竹艺村旅游业态的同时,也为农户发展层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要素。三层发展层级的互动推动着整个旅游地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为案例,基于全球地方化背景对乡村旅游治理模式转变下不同主体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进行了探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在全球地方化背景下,竹艺村为获取充分的资本、人才、管理等全球化发展要素来支持地方发展,从而引入企业等外部主体进入乡村进行开发。外部主体与发展要素的流入推动了LOT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全球化发展要素主导,地方化和个体化发展要素被动响应的整合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互动关系亦带来了弊端。为解决问题,竹艺村开始注重分配公平和发展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从而引入CBT模式进行融合。CBT模式下社工主体的进入与村企业的成立推动着自下而上的发展要素互动关系的形成。最终在LOT与CBT模式的融合中发展要素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整合的互动关系。

在不同旅游治理模式下,不同主体因自身具有的发展要素及整合能力相异,在旅游发展中获得收益存在差异。在LOT模式中,相较于外部企业,村民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较低,且自身发展要素亦较薄弱,在与企业争夺部分发展要素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获取的收益相对较低。在CBT模式中,村民在社工的引导与帮助下提升自身对发展要素利用能力的同时,通过创立乡村企业来整合全球化和地方化发展要素,以此谋求生计来源的拓宽和社区内部收益能力的提升。在不同旅游治理模式下村民生计结果的不同不仅在于自身所掌握资源的多少,更在于其是否具备整合和利用发展要素的能力。

随着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发展要素互动关系由自上而下的单向整合转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竹艺村的旅游发展形成竹艺村-村企业-村民层层嵌套的3层发展层级。在LOT模式下,外部企业利用全球化发展要素对地方和个体化发展要素进行整合以促进整个竹艺村文旅项目的发展。此阶段形成竹艺村项目与农户家庭两层发展层级。由于竹艺村项目在LOT模式中占据主要的发展要素,因此农户家庭这一层发展层级在LOT模式下享受着竹艺村项目带来的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被逐渐边缘化。伴随着CBT模式出现的是乡村企业这一发展层级,乡村企业通过将个体化发展要素进行集合,向上整合地方化发展要素以此经营相关产业。乡村企业是位于竹艺村项目与农户家庭间的第二层发展层级,在接收上层发展层级形成的发展红利的同时,亦为下一层发展层级输送新的发展资本,最终形成三层发展层级之间的流入-反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带来发展要素互动路径的变迁,同时不同旅游治理模式的融合会进一步推动旅游地发展层级的分化。

最后,社工的进驻推进了竹艺村CBT模式的融入。社工通过提升村民整合和利用发展要素的能力和意识提升村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度,并使其了解到如何通过优化个体化发展要素与地方化发展要素的利用来获取更多收益。更重要的是,村民形成了集合个体化发展要素并向上整合地方化发展要素的意识与能力,促使竹艺村在原有发展层级的基础上融入了链接上下层的乡村企业发展层级,让发展要素得以在3层发展层级间充分流动,实现两种模式的优势叠加。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于漪博士在英文摘要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华南师范大学2018级本科生郑林洪、朱晓芙、朱冬艳对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支持和协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Yavuz K B, Savran S R: Glocalization and tourism relation: Bauhaus architecture in Tel Aviv example[J]. İdealkent, 2020, 11(Kentleşme ve Ekonomi Özel Sayısı): 1205-1222.
- [2] 杨兴柱, 王群.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地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 2007(1): 60-66. [Yang Xingzhu, Wang Qun. Research progress of under Global- local nexus in tourism destination. *Tourism Tribune*, 2007(1): 60-66.]

- [3] 陆林, 张清源, 许艳, 等.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J]. *地理学报*, 2020, 75(2): 410-425. [Lu Lin, Zhang Qingyuan, Xu Yan et al. Rescaling of tourism destination under the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2): 410-425.]
- [4] 刘逸, 黄凯旋, 保继刚, 等. 嵌入性对古村落旅游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以西递、宏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1): 128-136. [Liu Yi, Huang Kaixuan, Bao Jigang et al. Impacts of embeddedness towards tourism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historic villages: A case of Xidi and Hongcu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 128-136.]
- [5] 周国忠, 姚海琴. 旅游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以浙江顾渚等四个典型村为例[J]. *浙江学刊*, 2019(6): 133-139. [Zhou Guozhong, Yao Haiq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aking four typical villages such as Guzhu in Zhejiang as an example.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19(6): 133-139.]
- [6] 陆林, 张清源, 黄剑锋, 等. 基于全球地方化视角的旅游地演化理论探讨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21, 76(6): 1504-1520. [Lu Lin, Zhang Qingyuan, Huang Jianfeng et al. A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ospect of tourism destination evolution based on a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504-1520.]
- [7] 黄鑫, 邹统钎, 储德平.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J]. *人文地理*, 2020, 35(3): 93-103. [Huang Xin, Zou Tongjiao, Chu Deping.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model of tourism village governance: A vertical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in Shanxi from 1949 to 2019. *Human Geography*, 2020, 35(3): 93-103.]
- [8] Qian C, Sasaki N, Jourdain D et al. Local livelihood under different governanc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uangshan mountain are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1(8): 221-233.
- [9] Qian C, Sasaki N, Shivakoti G et al.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local perception in the Huangshan mountain area[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6, 20: 112-123.
- [10] Robertson R.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M]//Featherstone M, Lash S, Robertson R.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 25-44.
- [11] 陆林, 任以胜, 徐雨晨.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J]. *地理学报*, 2019, 74(6): 1267-1278. [Lu Lin, Ren Yisheng, Xu Yuche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 of "ruralismecology" spa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ed by touris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6): 1267-1278.]
- [12] Milne S, Ateljevic I.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local nexus: Theory embracing complexity[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4): 369-393.
- [13] 黄翊勤, 彭惠军, 苏晓波. 全球在地化背景下文化遗产地游客的酒吧消费体验研究[J]. *旅游学刊*, 2021, 36(10): 26-38. [Huang Chiqin, Peng Huijun, Su Xiaobo. Glocalization and the touristic consumption experience of bars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0): 26-38.]
- [14] 史玉丁, 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 33(2): 15-26. [Shi Yuding, Li Jianjun. 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collaborative study. *Tourism Tribune*, 2018, 33(2): 15-26.]
- [15] 杨昀, 保继刚. 治理模式分异对旅游地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阳朔遇龙河景区个案分析[J]. *人文地理*, 2018, 33(6): 112-117+124. [Yang Yun, Bao Jigang. Study on differentiation of governance model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Yulong River scenic attraction in Yangshuo. *Human Geography*, 2018, 33(6): 112-117+124.]
- [16] Hall C M. Archetypal approaches to implement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policy[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09, 34(3): 235-245.
- [17] D'Angella F, De Carlo M, Sainaghi R. Archetypes of destination governance: A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J]. *Tourism Review*, 2010, 65(4): 61-73.
- [18] 高婕.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实践及其反思——以黔东南苗寨侗寨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6): 134-140. [Gao Jie. The practice and introspection of the community involvement with the villages in eth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Miao Villages and Dong Villages in southeast Guizhou Province.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37(6): 134-140.]
- [19] 杨昀, 贾玓. 乡村振兴背景下古村落旅游治理模式变迁与启示[J]. *安徽农业科学*, 2020, 48(16): 134-136. [Yang Yun, Jia Ding.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hange of tourism governance model in ancient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0, 48(16): 134-136.]
- [20] 李德明, 程久苗.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探析[J]. *人文地理*, 2005, 20(3): 84-87. [Li Deming, Cheng Jiumiao.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of mut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economy. *Human Geography*, 2005, 20(3): 84-87.]
- [21] 王京传, 李天元. 国外旅游目的地治理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13, 28(6): 15-25. [Wang Jingchuan, Li Tianyuan. Review on tourist destination governance in foreign countries. *Tourism Tribune*, 2013, 28(6): 15-25.]
- [22] 孙九霞, 黄凯洁, 王学基.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 逻辑与案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3): 39-49. [Sun Jiuxia, Huang Kaijie, Wang Xueji.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local experiences: Logic and cases. *Tourism Tribune*, 2020, 35(3): 39-49.]
- [23] Blackstock K. A critical look at community based tourism[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05, 40(1): 39-49.

global-local nexu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4] Chang T C, Milne S, Fallon D et al. Urban heritage tourism: the

23(2): 284-305.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Mode and Development Elements Interaction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calization: A Case of Bamboo Craft Village in Chongzhou County, Chengdu City

Zheng Shilin^{1,2}, Huang Huan², Zhang Xiaomeng², Shi Tiantian²

(1. Schoo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Geography,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Under glocalizati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 closely tied wit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crucial empirical question lies in promoting various elements advantages through rural governance to encourage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further. Taking the Bamboo Craft Village in Daoming Town, Chongzhou County,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tegration and response mechanics in tourism element integration.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ing from Lease-Operation Tourism mode (LOT) to LOT-Community-based tourism mode (CBT). Here, LOT refers to the company-led-tourism mode that motivated various actors of globalization to promote local development. CBT refers to the community-led tourism mode where it has deeper embeddedness with the local village, protects local recourses and local villagers' rights.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1) Governance modes have determine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elements. These interactions then led to new problems, which further motiv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governance mode. The developmental elements' interactions and the change of governance modes revealed a cyclical action path. 2) Different sectors have different utilizing and integrating modes of various elements, leading to differentiated benefit gains from tourism. In LOT mode, compared to the tourism company, villagers have a relatively weak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and have a relatively low benefit gain. Hence, their passion for tourism participation also reduced. In CBT mode, villagers could improve that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workers. They could set up village companies to integrate tourism resources, improve the whole community's ability to benefit from tourism. 3) Bamboo Craft Village has formed a nested-three-layer developmental mode with different tourism governance modes, including layers of the Bamboo Craft Village, village company and village household. Under the LOT mode, companies from outside would utilize elements of globalization to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promote localized and individualized tourism. This stage shaped two layers composed of Bamboo Craft Village and villagers. Meanwhile, villagers are marginalized in this proc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BT, village companies could interrogate individualized elements and promote localized industries. Here, village companies become the middle layer between households and Bamboo Craft Village. 4) The two modes have combined their advantages throug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CBT to LOT is closely tied with social workers'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Social workers have motivated villagers by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integrate elements and tourism resources to benefit. Villagers have shaped their knowledge and sense to integrate resources to enable Bamboo Craft Village to integrate with village companies and village households. In so doing, it could combine each modes' advantages. This study has two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irst, it clarified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s impact on rural tourism through a lens of developmental elements. Second, it summarized the nested-three-layer mode influenced by tourism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to similar tourism sites.

Key words: glocalization; tourism governance; development elements; governance mode; rural tourism